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第六集（上）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 录

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

.....许德珩（1）

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主要问题

.....——访问“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17）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李 达（23）

回忆党的“一大”

.....陈潭秋（36）

党的一大前后

.....包惠僧（41）

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

.....廖焕星（59）

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及中共旅欧支部的情况

.....徐特立（68）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

.....（70）

罗章龙教授谈“二七”大罢工

.....（75）

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王若飞（91）

革命的摇篮

.....王首道（115）

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

.....聶荣臻 (137)

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

.....罗荣桓 (149)

大革命失败与广州起义

.....叶剑英 (158)

奔向海陆丰

.....徐向前 (166)

从黄麻起义到鄂豫边割据

.....**王树声** 陈再道 詹才芳 (173)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诞生

.....邵式平 (190)

激流归大海

——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粟 裕 (203)

关于六大的研究

.....周恩来 (229)

革命风雷起平江

.....李寿轩 (250)

广西右江的红色风暴

——回忆白色起义.....袁任远 (258)

湘鄂西初期的革命斗争

.....贺 龙 (269)

洪湖红色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许光达 (280)

古田会议前后

.....赖传珠 (290)

巧使敌人就范

.....杨至成 (302)

鄂豫皖红军的反围攻斗争

.....徐向前 (309)

湘赣根据地革命斗争回忆

.....王首道、王 震等 (325)

叶坪乡的查田运动

.....王观澜 (336)

回顾长征

.....刘伯承 (349)

遵义会议的光芒

.....张南生 (363)

在长征的道路上

.....马忆湘 (373)

奠基礼

.....徐海东 (397)

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斗

.....聶荣臻 (403)

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

许德珩

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斗争的主力是学生，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所以我先从“北大”谈起。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老的大学，它的前身是“戊戌维新”中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到“五四”那年已有二十一年的历史，有文、法、理、工、商五科和预科学生约一千八、九百人。1916年以前，校风很腐败。学生年龄一般比较大，有些人还参加过科举，还有些学生是举人，秀才。

1916年冬，北京政府派了蔡元培来当校长。蔡是清末的翰林，但思想开明，辛亥革命中参加过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任教育总长，国民党反袁失败后流亡海外，袁死后回国。蔡到校不久，宣布他的办校宗旨是“兼容并包”，提倡“学术思想自由”。

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大教师的阵容很快发生了变化，其中包括几种类型人物：

第一，是后来围绕着《新青年》杂志、即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如文科学长（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图书馆长李大钊，以及鲁迅等。陈独秀原在上海办《青年》杂志，到北大不久就改名为《新青年》，主张用白话文写文章，鼓吹文学革命。李大钊和鲁迅当时经常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大

概1917年秋，胡适由美国回来，到北大任教。《新青年》里，一方面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同时也有胡适，王星拱，刘半农，周作人等人。《新青年》初期的基调，没有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只有到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18年11月，中国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才开辟了一条民主启蒙运动的革命大道。

同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胡适则提出“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二十年不谈政治”，等。在胡适影响下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俞平伯等还办了一个《新潮》杂志，主要宣传文学改良运动。必须指出，当五四运动发动时，胡适因母丧回安徽原籍，不在北京，后来他也未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更谈不到什么“领导五四运动”，可是五四运动的革命怒潮，却真是把胡适吓倒了。当胡适由家里转到北京的时候，北大和其他各校学生正在罢课，胡适曾出面劝说学生复课，但被学生正义拒绝。胡适想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也没有成功。

第二，是无政府主义拥护者。蔡元培聘请了李石曾来北大教生物学，吴稚晖当学监。李、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巴黎办《旅欧周刊》，由后来成为大汉奸的褚民誼任编辑，经常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欧洲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蔡元培本人也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青年学生的社会科学知识水平太低，经这些社会“名流”一提倡，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不少北大学生中颇为流行。记得其中最活跃的有（黄）凌霜、（区）声白、（赵）太侔等人，他们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自己的名

字上多半不冠姓。他们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认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1918年5月21日的示威请愿运动，北大学生中有无政府倾向的人都没有参加。

第三，是“国故”派人物，如有名的保皇党分子辜鸿铭，拥护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年仅二十余岁的梁漱溟（教印度哲学）。还有以黄侃、刘师培等为首的“卫道派”，他们反对白话文，于1919年刊行主张全面复古的《国故月刊》。

各种政治团体相继诞生

在“学术思想自由”的口号下，北大师生中成立了很多社团，象哲学会、雄辩会、音乐传习所、新剧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学生储蓄银行、同学集股办的消费公社。还有新闻研究会，《京报》主笔、名记者邵飘萍每星期日给我们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这个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毛主席也参加过。蔡元培对它特别重视。当时著名的书画家陈师曾，音乐家肖友梅，陈天华，都网罗在这些学会之中。21岁的画家徐悲鸿则担任画法研究会主任，后来并资送他到法国学画。

此外，蔡元培本人还发起了“进德会”，提倡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等等，它以消极的“不参加”办法来抗议旧社会，表现了蔡元培的“道德救国”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超政治”的幻想。

1918年5月，留日学生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遭到日本政府镇压，大批学生罢课回国。北京学生立即奋起响应。5月中旬归国学生代表到了北京，和我们见面。经过几天的奔

走酝酿，5月21日北京学生发动了向反动政府示威请愿运动。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参加的有北大、高师、高工等校二千多人，当时推出向公府（即总统府）请愿的代表八人，其中北大三人，即许德珩、易克嶷、段锡朋。这个中国学生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前奏。

但是这次运动，由于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不足，缺乏有力的领导，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时，北大内部有一帮坏学生如傅斯年等，破坏运动，事先跑到公府告密，说我们要“纠众造反”，这“只是少数人运动，不代表全体学生”，等等。傅斯年等的无耻行为受到了蔡校长的斥责，也受到多数学生的鄙视。

这次游行请愿导致了北京和天津的学生起来组织自己的政治团体——学生救国会。首先是北大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也参加进来。暑假中派出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南下联络以通声气。我们先到天津，那里已有了组织，开会欢迎我们。到会的人很多。我记得有：马骏、郭隆真、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北洋大学学生，后改名张太雷）等。正当欢迎会开得热烈的时候，张传琦忽然拿把菜刀把自己的一个手指砍掉，以此激励国人。以后他们还组织了一个“觉悟社”。周恩来同志由日本回到天津后，“觉悟社”就更加发展起来。邓颖超同志也出来了。我们由天津到济南，找到了康生，他当时名张绍卿，又名张三洗。后又到武汉，见到了恽代英。他们那里组织了一个“文化书社”。我和恽代英原来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一见如故。我们由武汉到了九江，找到了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和邓毅生，到南京找到了金陵大学学生黄仲苏，也找到了湖

南林祖烈（林伯渠同志之弟）以及其他许多人。上海学生方面有复旦的狄侃，华侨学生何葆仁，圣约翰的瞿宣颖，河海工程学校的张闻天、沈策民和南洋公学的恽震等人，还找到了为我们奔走的“上海通”黄警顽。上海妇女方面的人特多，我们会见了留日归国的女学生李果、程孝福，神州女学舒惠贞，黄兴夫人黄宗汉，女子救国会的朱剑霞，还有从天津去的刘清扬。她们成立了上海女界联合会，宣传爱国，抵制日货。女界联合会“五四”以后也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还拜会了孙中山先生以及廖仲凯、朱执信先生。他们以后办了一个周刊《星期评论》和月刊《新建设》与北大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南北呼应。我们还联系了《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叶楚傖，《时报》的戈公振，《申报》的史量才，江苏省教育会的黄炎培、沈恩孚，商会的虞洽卿、荣宗敬。这时毛泽东同志往来于京沪，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他团结了男女青年数十人，其中有蔡和森、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女会员有向警予、李思安、周敦详、魏壁、劳君展、蔡畅、杨润予等。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办了一个《救国日报》，我们有事就互相商量，于工作便利不少。同时，上海的学生会也组织起来了，七月的某一天在龙华体育场召开大会，并欢迎我们，到会的有几千人，甚为热烈。这个会邀请了北京学生代表报告北京学生运动情况。我们在上海停留二十多天，联络的结果，各地学生纷纷加入学生救国会，使它很快变成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

为了加强联系，扩大宣传，救国会出版了一个刊物，叫做《国民》杂志，于1919年元旦问世。担任编辑的，有邓中

夏、黄日葵、高君宇、陈宝鏊、陈中凡、马骏等，还邀请了李大钊做我们的指导，邵飘萍做顾问。李大钊常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文章，包括头几期中的两篇批判胡适的文章。邓中夏用“大壑”的笔名每期为杂志撰写“国内外大事”。

《国民》杂志第五期上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前一部分，它是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一个中译本，译者是北大学生李泽彰，可惜没有登完！

到群众中去宣传

这里还应当提到“平民教育讲演团”，它是北大学生的一個组织，1919年3月成立。先是北大有一个“校役夜班”（工人夜校），目的是为校内工友补习文化，讲解时事，反应很好。以后扩大到校外，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便组成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毛泽东同志也参加过这个组织，指导我们的活动。在成立会上推选邓中夏为总务干事。当年（1919）三、四月间，讲演团常到街头讲演，出发时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组，事先拟好题目，选定地点，打着讲演团的白布小旗，仿照基督教救世军的办法，打起锣来就开讲。庙会是我们很好的讲演场所，可是常常被警察干涉。这个讲演团到五四运动时就成了学生会的一个组织，参加的人几乎每天都要到街头讲演，或贩卖国货和书报。

学生救国会本身这时也有发展。上次的示威请愿只有男学生，没有女学生，也没有工人参加。大家认为这是孔孟思想的影响。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于是大家提出“打倒孔家

店！”“打倒礼教！”的口号，并要求北大开女禁，实行男女同校，以求达到妇女的解放。

对于五四运动起了催生作用、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杰出人物是李大钊同志。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1917年到北大，1918年6月30日发起联合各方面青年有志之士，组织了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主要参加者有：（一）向往俄国十月革命的人，（二）因反对日本侵占山东而抗议回国的一部分留日学生，（三）从事爱国运动的国内各校少数学生。就我记忆所及，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鹤鸣）、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赵世炎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当中好些位起着领导作用。参加者中还有杨钟健、许德珩、章廷谦（川岛）以及周炳琳等。反动的国家主义分子、后来堕落为“青年党”的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也混进了这个组织。会员最后发展到一百零八人。它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它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由李大钊任主编；又出版了《少年世界》，邓中夏为负责人之一。学会会员分散在全国各大城市，都同情或参加了五四运动，对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和联系作用。少年中国学会得到了蔡元培的有力支持。

反对卖国条约的斗争

1919年4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举行分赃的巴黎和会，决定要把原来德国强占我国山东的“权利”判给日本帝国主义继承，同时又拒绝了取消袁世凯和日

本订立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提议。5月2日我从蔡校长那里知道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后，立即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办法。高工的一位学生代表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大家激动得眼里要冒出火来。于是发出通知，决定在5月3日（星期六）晚七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即后来的北大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约了北京十三个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参加，计有北京大学、清华学堂、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学院、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商业专门学校、汇文学校（燕大前身）、铁路管理学校、高师附中等，到会的人极为踊跃，推定北大法科四年级学生廖书仓为临时主席，推文科学学生黄日葵等三人做记录，许德珩起草宣言，丁肇青、谢绍敏、张国焘、许德珩、夏秀峰等很多人发言。大会议决进行办法四条：（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急电中国参加巴黎和会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北京群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会开得很紧张的时候，有一位十八、九岁的同学拿出一把菜刀来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北大法科学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咬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全体代表情绪更加激烈。

5月4日清晨，北京各校学生大约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广场。头天夜里，北大西斋的同学一夜没睡，用竹竿做旗子，长的做上大旗子，短的做上小旗。因夜深买不到白布，我把自己的白布床单撕成条幅，书写标语，一直搞到天亮。

有的同学咬破手指，写下血书。那时还没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标语大都是“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等。

那天到天安门广场最早的是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和军警劝阻，到天安门最迟。在天安门停了很久，各校学生代表演说游行示威的意义，群呼口号。后来有人提议往东交民巷示威，于是游行队伍就往东交民巷。先到美国驻华使馆。当时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一向不许中国人结队进出。我们在军警林立下先到美国使馆，递了一份英文“说帖”（即抗议性质的备忘录），因为巴黎和会主持人之一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示威群众的代表向接见的人陈述了游行示威的理由和要求，高呼口号，离去后又到日本使馆。军警围了三四层，真是如临大敌，不让队伍接近有日军守卫的日本使馆大门。我们群情激愤地在这里喊了许久口号。大家不想同日方正面冲突。这时有人提议：“我们找卖国贼算帐去！”于是大队出东交民巷，经御河桥，东单牌楼，直奔赵家楼曹汝霖的家。曹当时是交通总长，他曾以外交次长身份签字于“二十一条”，正是爱国群众斗争的目标。

火烧赵家楼

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于是变计，向军警讲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找曹总长谈谈，要他爱中国。

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久说服教育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紧闭。怎么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后来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办法，同他们讲好话。学生之中有两个身材很高的同学，其中一个是高师的学生，名叫匡日休。他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底下，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蹑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对外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原来曹汝霖正在同另两个卖国贼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以及日本新闻记者中江丑吉开会。他们以为有重兵把守，想不到学生会进来。一见学生进来，曹、陆二人立刻从后门溜走，只剩下章宗祥、丁士源（参战督办处军法处长）和中江在客厅中。这三人被包围起来，不得脱身。大家见到章宗祥，以为是曹汝霖，都上去打，把他打得头脸出血，倒在地上。有细心的同学，先切断了电话线，取下客厅里挂的曹汝霖的照片来一对，原来不是曹汝霖，人就散开了。中江丑吉因掩护章宗祥，也被群众痛打一顿。丁士源则乘混乱之际逃出。随后我们来到曹汝霖的卧室，卧室里还有日本女人，由大家保护出去。有一个同学抽烟带了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火起，房子也就烧起来了。

由于丁士源逃出求救，半小时后，军阀政府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队军警赶到，用武力把群众驱散。我们这时正要整队出去，军警说我们杀人放火，随即开始捕人。大批的人早已撤离，剩下我们少数想维持秩序、整

队而行的同学，被他们逮捕了。我和易克嶷被捕后，他们故意侮辱我们，把我们两人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步军统领衙门（在前门里公安街，当年叫户部街）。记得在板车上，易克嶷还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时已经是午后五时了，陆续到监狱来的有各学校学生三十一人和市民一人，共三十二人。我们三十二人被囚禁在步军统领衙门的一间监房里，极其拥挤肮脏，只有一个大炕，东西两边各摆一个大尿桶，满屋臭味。每半小时要听他们的命令翻一个身，到中午“放风”才能大便，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看守的人每天提一桶开水，每人发一个大窝头。对看守牢房的人，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工作。

营救被捕同学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了解到，“五四”的第二天，北京的全体学生都发动起来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从城外赶来参加，和大家商量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北京女高师学生因校长陈宝泉顽固，不准她们游行。“五四”当晚她们全体都聚在步军统领衙门门口吵闹，要进来一同坐牢。这时北大的学生救国会才改为北大学生会，5月6日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五四运动如火燎原般地发展起来。

我们得到外面的消息，北洋军阀对这事的处理意见和办法，分为死硬和怀柔两派：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段祺瑞和王怀庆等，主张严厉镇压；另一派徐世昌、冯国璋等则恐怕高压屠杀，运动扩大起来更不好收拾，主张采取怀柔政策。两派意见貌似冲突，实则都要消灭学生爱国运动。

5月5日，当时北京军阀政府曾令司法部“查明为首的

肇祸诸人，依法讯办”，并命军警“维持地方秩序，严防学生扰乱”。又令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大卖国贼，说他们三人“公忠体国，有裨大局”。这就是说学生爱国有罪，军阀官僚卖国则“有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大局”。但另一方面，由于五四运动的正义性，不仅青年学生热烈参加，而且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社会名流从孙中山到民社党的林长民，都通电宣告学生无罪。自从学生被捕后，政局一直严重，而在广州的临时国会的参众两院议员，且有趁此倒阁之势。段祺瑞亲日派势单力薄，若坚持镇压学生，势将引起更大的风潮，必导致全部失败。在此形势下，他们于5月7日将三十二名被捕学生和市民全部释放。

我们是在5月7日上午十一时许被释放的。北大全体学生都在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上等候我们的归来。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借来了三辆小汽车，我们就是分别坐着这三辆小汽车回来的。广场上放着五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北大同学大约十二、三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见面。大家情绪万分紧张。蔡元培校长讲了一些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淚交流。有人说，“还是快去休息一下罢”。我们才从桌上跳下来，走到红楼的休息室，有的返回各自的宿舍，有的直接去办理《五·七》刊物出版工作。

北京学生罢课

学生释放后，斗争并没有结束。第一，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并没有拒绝签字的表示；第二，曹汝霖以学生烧了他的房子，打了他们，对为首的学生起诉，要求赔偿损失；第三，尤其紧要的，段祺瑞指使安福系阁员提出“整顿学

风”，首先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蔡果然在学生出狱的第三天，被迫辞职出京。蔡元培校长一走，胡仁源的任命，加上曹汝霖的反攻，对学生运动如同火上加油。学生们于“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收回山东权利”之外，又加上“要求蔡校长复职，反对胡仁源来校”这一强烈要求。9日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表示坚决挽留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全体提出辞职。我们释放的当天就出版了《五七周刊》，北京各校学生都组成宣传小组，分别作街头讲演，与军警几乎是短兵相接。他们又开始捕人了。学生一面讲演，警察一面捕人，讲的愈多、捕的愈众。

关于曹汝霖卖国集团所提出的、对“为首滋事学生”依“法”制裁的问题，5月13日参加“五四”游行的全体学生联名上呈检察厅：如爱国有罪，人人愿意自首，不能由少数同学负责；如果法院票传学生，愿意集体受传，少数同学决不出庭。这一表示使北京政府按照“法律”手续处理学潮的如意妙算终于破产。17日，北京中等以上十三校学生，以政府镇压爱国运动集会，议决自19日起再行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在山东问题上签字、惩办卖国贼曹、章、陆，挽留傅增湘（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等要求。19日，北京学联宣布中等以上学校全体罢课，并发出罢课宣言。这是继“五四”游行之后北京学生对卖国集团进行的又一次斗争。北京军阀政府指学生此种举动为“纠众滋事、扰及治安”，限令三日之内一律上课。学生表示拒绝，各校代表在北大三院开会，商讨对策。三院被军警重重包围，会议决定扩大运动，推出代表许德珩、黄日葵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呼